

# 封建性與現代性的衝突

## 日據時期台韓小說中的女性處境

崔末順（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

一般認為 1920 年代為台灣進入現代的起點。依照臺灣民報系列報章雜誌的報導，當時的新知識分子普遍認為文化主義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潮流；其中，他們最為重視民族自決、男女同權、勞資協助等時代潮流，同時也接受西方啓蒙精神和現代價值，以引導一般民眾的自覺，進而進入現代國家之林。不過，以人的理性和歷史進步為核心內容的現代性，伴隨著殖民資本主義的推行，加上台灣社會封建性的殘存，在男女同權和女性解放問題上，呈現出複雜多重的壓抑狀態。

而這些狀況，在當時韓國的女性問題上，也有非常類似的發展。日據時期韓國小說所呈現的女性問題，大多是由傳統封建主義的女性差別，加上由於殖民資本主義的剝削性質所引起。當時處於社會底層的女性，在殖民者、資本階級、男性構成的社會結構中，受到民族、階級、性別的三重壓抑；而受過教育的新女性，想要在一般家庭男女有別的封建觀念，以及在不夠成熟或開放的社會中，施展理想抱負，或者探索自我、實現自我，都是一條至為艱難的道路。

本文以日據時期台灣和韓國的小說為對象，考察同在日本殖民地處境中兩國的女性問題。文章分為社會底層女性和新女性兩個方面展開討論，並從封建性和現代性的衝突、殖民資本主義帶來的價值觀等多重關係當中，探索現代初期兩國女性的處境和經驗樣態。相信這些考察對共有傳統儒家價值觀，並於現代初期同樣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和資本主義經驗的東亞國家，在其女性問題的了解上，可以帶來一些助益。

**關鍵詞：**日據時期台韓文學、女性小說、新女性、社會底層女性

## 一、前言

在東亞國家中，台灣和韓國在進入現代的歷史階段時，均曾受到已先一步接受現代性洗禮並成為後發資本主義<sup>1</sup>、帝國主義國家日本的侵略，先後淪為殖民地。儘管其接受殖民統治的時間先後長短不同，<sup>2</sup>但該時期的兩國歷史進展，同樣都是透過日本接觸西方，接受西方的現代精神和價值體系，並在失去主權的狀態之下，於對抗日本統治的同時，被迫產生民族和國家認同。該時期兩國共有的這些西方價值的接受、知識分子對民眾的文化啟蒙，以及對殖民資本主義作出因應等時代精神，我們通常以現代性課題來加以探討。

在現代性課題當中，由於 1920 年代前後日本對殖民地所採取的文化政策，加上二次大戰後世界潮流的湧進，以及武裝抗日運動的失敗，兩國都出現以文化啟蒙方式對民眾傳播新文化以替代政治性抗爭的情形。<sup>3</sup> 而在文化啟蒙運動中，肯定人的理性及相信歷史進步等西

---

**致謝辭：**本文原為「東西方文學中女性的自我實現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2006 年 9 月 30 日）上之發表論文，會中論文回應人黃錦容教授及與會學者提供了寶貴意見，謹此致謝。另外，本文投稿期間，亦蒙兩位匿名審查學者提供珍貴的修訂意見，特此表達由衷的謝意。

1 日本雖於明治維新後，打破封建體制，並在國內完成了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各種建設，但其資本主義仍屬初步階段，並未到達為擴張消費市場，非侵略他國不可的地步。1895 年，日本獲得甲午戰爭賠償金，奠下資本主義基礎，接著，在大正時代（1912-1926）成了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正式侵略太平洋沿岸的西伯利亞，獲得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機會。如此，當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時，與西方國家的發展對照，才步入世界市場並追求資本主義發展的日本，乃被稱為後發資本主義、後發帝國主義國家。

2 台灣前後 51 年，韓國共 36 年。

3 當然，這個時期兩國都曾有政治性結社情形，並提出政治主張，但受到日本打壓之後就逐漸消失（陳俐甫，1996: 59-86；鄭英勳，2006: 62-91）。

方現代性的核心內容，最受知識分子的青睞，此因當時知識分子從西方現代性當中，找出了西方及接受西方新文明而成為強國的日本的強盛原因，因而試圖接受西方現代的合理主義，以求改造民眾，進而作為建設現代國家的基礎。

現代性這個文化啟蒙的背景理念，主要根據於相信人的理性；而對個人具有理性的想法，又來自於擁有獨立自主的個人的發現。因此，當時普遍以獨立自主的個人觀來認知女性的存在，可以說是女性被發現的時期。在台灣，初期有關女性問題的討論，是從女性解放的口號開始，其現代女性論述的主要焦點，乃基於當時社會缺乏平等意識、自由思想、人權等觀念，以及制度上的缺乏保障，以致在父權權威和貧窮的環境之下，女性不僅無法接受教育，連婚姻自主也被剝奪，甚或成為童養媳、養女，而一輩子過著坎坷悲慘的生活。因而初期有關女性的論述，都在主張改善女性這種嚴重不平等地位及人權遭到蹂躪的情況，而知識分子開始對民眾進行啟蒙教育，其具體的內容有：重視女性自覺的教育（陳英，1920: 19-20；王敏川，1920: 41-43）、主張廢除男女差別（黃璞君，1920: 34-36）、獎勵自由戀愛和自由結婚（陳崑樹，1921: 23-31）等方案；屬於改善男女差別制度範疇的，如改革納妾制度、廢除法律上的不平等、改善婚姻制度的舊俗、打破社會不良制度（劍，1923；秀湖，1924）、檢討家族制度（劍如，1924）等方案。另外，他們也以報導英國等先進國擴張女性參政權、各國婦女的政治活動<sup>4</sup>等作法，試圖借鏡先進國家的例子來喚起社會的注意，可見他們為了達成女性解放的目的，從啟蒙到爭取平等和自由，有意識、有計劃地持續不斷進行著。

---

4 在《臺灣民報》的「內外時報」欄中，持續地介紹了各國婦女運動的動向。

女性解放的現代論述，在初期的《臺灣青年》<sup>5</sup>時代，著重在女性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上，強調女性教育為家庭教育的一環；不過到了1923年發行《臺灣民報》<sup>6</sup>的時候，已經從男女平等、機會均等的要求，進展到以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另一階段，來說明女性解放問題。換言之，婦女問題的焦點是從尊重普遍人格、女性的個人主體性，擴大到婦女參政權的主張、階級鬥爭的手段等，並很快地發展到與民族問題、階級問題的結合。這是因為當時的女性問題，本身即包含著擺脫舊習慣和禮教束縛的反封建性質，不僅具備了尊重人格和個性、人權解放等現代性屬性，它更是在殖民地現實上，能夠突顯出對異民族統治批判，以及人權遭受蹂躪的一種象徵，同時它也是關係著民族自治及民族平等乃至解放的一個問題。因此，女性解放問題，在往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始終持續不斷地被拿出來討論。

而同時期韓國的現代女性論述，也有非常類似的發展過程。一般來說，韓國在19世紀末進入現代時期，同時，早自1860年以來，東方日本的威脅，以及西歐資本主義列強勢力東漸之時，朝鮮封建社會即面臨解體危機。朝鮮對外成為外國勢力角逐場的同時，其內部也要面對封建支配階級和以農民為中心的民眾之間矛盾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在此雙重試鍊中，朝鮮從封建社會逐漸轉變成半殖民地社會。一部分兼具封建兩班<sup>7</sup>身分，並接受新文明的開化派人士，在1884年

5 由創立於大正九年（1920）7月16日的「新民會」發行，是以留日台灣學生為對象的刊物。大正十一年4月改名為《臺灣》，於大正十三年6月停刊。

6 「新民會」機關刊物《臺灣青年》於大正十一年（1922）改名為《臺灣》後，該雜誌的同仁於大正十二年4月另創《臺灣民報》，後於昭和四年（1929）改名為《臺灣新民報》。

7 韓國高麗、朝鮮時代的統治階層和官僚組織，兩班為東班和西班的統稱，一般指文武官僚。

發動朝鮮內部的改革運動「甲申政變」；與此相反，農民等民眾勢力則在 1894 年引發反外國勢力、反封建鬥爭性格的「東學農民運動」。

這個時期，雖然朝鮮還沒有淪為日本殖民地，卻已成為西歐列強、日本、中國和俄羅斯虎視眈眈的一塊肥肉。因此，當時的知識分子在文明開化和反對外來勢力這兩個矛盾的時代精神當中，努力去尋找平衡點。他們採取的策略是透過接受西歐科學和合理精神，來對付正是由此強盛起來的西歐和日本。在此情況下，首先展開的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文化運動，一部分兩班出身的「開化派」<sup>8</sup>人士和啟蒙知識青年，透過出版運動、國文運動以啟蒙民眾，並企圖以政治性團體，達成資產階級改革的政治要求。由於文化啟蒙運動的目的，在於接受西歐現代精神，改造國民思想和創造文化，因而有關女性的個性發現和平等主張，乃成為時代主流聲音，女性教育的重要性遂受到重視，並被積極提倡。儘管如此，當時所提出女性教育的目的，並非在於女性的自我實踐上面，而是基於實用層面的認知，因為他們強調知識女性在照顧家庭和小孩的養育工作上，將更具實質幫助。

在這些以資產階級為主的文化啟蒙運動中，已可看出女性團體的參與，這說明隨著 19 世紀末開放門戶引入西方技術和制度之後所實行的新教育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開始發揮了影響力。這些受過新教育的女性，開始參與國家、社會議題的討論以及政治活動。當時成立的

---

8 19 世紀末韓國的知識界為因應西方列強的入侵，出現了兩種不同派別的時代精神：一是堅持傳統朱子學的「為政斥邪派」，他們反對天主學等西方文化的傳來，以對外抗爭方式來因應時代危機；另一是，認同社會進化論，但站在自主性立場上接受西方的現代文物，以謀求轉化為現代國家的「開化派」。其後，隨著時局變化，以及改革政治呈現方法上的意見分歧，「開化派」又分為「急進改革派」和「穩健開化派」：前者效法日本的明治維新，主張進行體制改革；而後者則效法清朝的變法自強，主張漸進式改革。

「讚揚會」、「愛國婦人會」等組織，即是隨著政治意識的成長，女性實際參與公共領域的例子。不過，這些團體重視救國的層面，更勝於主張女性權利（韓國女性研究會，1992: 113-114）。嚴格說來，必須等到 1920 年代，一批從女校畢業或日本留學歸來的新女性成為社會性階層時，韓國女性解放理念才正式建立。這些女性透過新式教育學習現代意識，對女性運動負有莫大的使命感。與台灣情況一樣，韓國由於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性，1920 年代展開的女性運動，可概分為自由主義女性解放運動、民族主義女性解放運動，以及社會主義女性解放運動三個方向。這些女性運動團體，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有關女性教育、女子解放等主張的文章，試圖刺激一般女性的意識，促使她們積極參與教育啟蒙。此外，她們也努力廢除蓄妾制度和公娼制度，並參加當時的社會性運動「物產獎勵運動」（金福順，1992: 28）。

另外，除了這些女性團體之外，尚有一些屬於自由主義女性解放運動，但不參加組織性活動，而堅持個人性活動的激進女性，例如被認為是韓國最早的女性文人金明淳、羅蕙錫、金一葉等人即是。這群女性都有日本留學經驗，並透過文學作品和論說文章，強烈主張女性的解放。這三位女性一般被稱為「第一世代新女性」，她們共同提出自由戀愛和性自由等反封建的主張；其中，自由戀愛概念與女性解放，對當時女性帶來很大的衝擊和影響。<sup>9</sup>她們受到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從個人層次上探討戀愛和結婚問題，並認為舊道德和傳統規範，既是父權制度的產物，更是壓抑女性的罪魁禍首，進而主張女性應從性道德中解放出來，才能從壓抑人類自由的所有因襲當

9 她們的自由戀愛思想，請見廚川白村（1921），〈近代戀愛觀〉，《廚川白村全集 8 卷》。東京：改造社。

中獲得解放，因而提出了「新女子主義」（金明淳，1924、1925；羅蕙錫，1914；金一葉，1920、1921）。當時一般女性團體僅止於反對蓄妾或主張自由婚姻，這些正面否定父權制度的性道德主張完全顛覆父權性別道德體系。

不過，這些新女性的主張，都具有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因而無法從中看清一般女性在殖民地狀況中受到父權制度和殖民資本主義雙重壓抑的實際情形。她們所主張的自由個性和人格尊重，在自由價值還沒建構的當時，很難被社會接受，更何況在只對女性要求貞節的價值觀底下，不易打破自由戀愛當中所內涵的男性本位性格；尤其她們並未在社會脈絡了解戀愛和結婚問題及引導女性的覺醒，自然馬上就受到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雙邊夾擊，因而到了1920年代後期這些主張便告消聲匿跡。

另外，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參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女性，透過「勤勞女性運動」，一方面對抗日本的殖民地掠奪政策，另一方面也開始成為意識形態女性運動的主軸。雖然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在於階級解放，但也因具備階級意識和視角，而可以直視大多數底層女性的現實問題。不過到了1930年「新幹會」和1931年的「權友會」解散之後，社會主義運動也急速地衰退下去，代之而起的是以基督教系統女性為中心的新復古主義「賢母良妻」論，並進而成為當時主流女性論述。

在了解上述現代女性論述的形成背景之後，本文擬將日據時期兩國小說中所呈現的女性處境，分為新女性和社會底層女性兩部分來進行探討。本文的討論範圍並不侷限在女性作家，而是以兩國小說當中能夠突顯該主題的作家作品，作為分析的對象。

## 二、新女性處境和自我實現努力

### (一) 日據時期台灣小說中的新女性

雖然在 1920 年代台灣的文獻當中找不到「新女性」這個名稱，不過我們可以將它理解為「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女性」，以與舊式女性的概念有所區隔。不過，在韓國，「新女性」這個名詞卻有其特定內涵，它不僅指知識女性，也是指接受新教育而獲得自我覺醒後，勇於挑戰父權道德規範，進而主張女性性解放的一群女性。本文中探討的新女性即包含上述兩方面意義，亦即接受新教育，以及對封建女性處境有所覺醒的女性。

在台灣日據時期小說中，描寫接受新教育並能做出自覺性選擇的新女性，首推呂赫若的〈婚約奇譚〉（1935）。這篇小說講述的是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新女性琴琴，拒絕父親安排的婚姻，用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的故事。琴琴雖然只念到公學校<sup>10</sup>畢業，但她參加社會主義運動，與左翼運動人士來往，是一位熱情、有個性，並對社會現實和自我處境有所覺醒的新女性。小說中雖未具體呈現，但她所追求的是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到來，在婚姻問題上面，也要按照自己的意思選擇理想對象。不過，她的父親為挽救沒落家道，想把她嫁給金龜婿，父親和兄長更用監禁來威脅琴琴放棄自己的想法。這時向她提親的是的有錢人家子弟李明和。不過，李明和是個行為放蕩，完全以男性為中心意識的人物。他貪念琴琴的美貌，央求同學又是琴琴朋友的「我」

---

10 日據時期對台灣人教育的第一環，主要以日語教學為主。當時的教育制度，係維持台灣人、日本人分離入學的政策：日本兒童進入「小學校」，台灣人子弟則入「公學校」就讀，兩種都屬初等教育機構。

幫他惡補一些社會主義相關知識之後，便假裝成社會主義者，擄獲了琴琴的芳心，並順利地跟她訂婚。但不久之後，琴琴就識破他是個「沒有階級意識的機會主義者」而拒絕結婚。於是，自尊心受損的李明和，便以警察與肅清社會運動為要脅，逼迫「我」講出琴琴躲藏的地方。

這篇小說塑造的女性人物琴琴，是個意志堅定、自我意識強烈的新女性形象。她對抗以父親、兄長與李明和為代表的父權權威，始終能貫徹自己的信念，毫無一絲懷疑或動搖。在婚姻問題上，她所追求的是能夠擁有跟自己理念相同且意氣投合的對象，與封建父權制對立。這裡可以看出，新女性肯定個性和自由意志的現代價值，對抗封建思想和家庭制度。另外，父親以財富為擇婿條件，可見這個時期以父親為代表的封建權威壓抑女性的本質，並不單純只有封建秩序而已，資本的邏輯也浸透其中。在殖民地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隨著許多日本商業資本家在台設立各種企業，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在1930年代已發展為以日本大企業為主的獨占資本主義形態，因此，地主階級等台灣土著資本階級急速地沒落下去。在此過程中，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結合並日益深化（周憲文譯，1985；喜安幸夫，1995），同時，金錢崇拜和物質萬能價值觀逐漸滲入到台灣社會，也產生了物化和疏離現象（崔末順，2005: 381-400）。可以說，琴琴就是在這種社會中被當作解決家庭經濟危機的一個手段。不僅如此，從李明和為了抓回琴琴威脅要動員警察的內容中，也可以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成為加重壓迫女性的另一原因。對此琴琴只好選擇離家出走，雖然小說中描寫琴琴得到朋友和同志的幫助，謀求經濟上的自立，但李明和逼迫追查，結果並不那麼樂觀。

這篇由男性作家描寫新女性的小說，當中社會主義階級意識係

其母題。遺憾的是，小說並未交代人物獲得此思想的契機、過程或經過，也沒有仔細刻畫女性面對婚姻的心理，而只是以生硬的口號加以理想化；不僅如此，以父親和兄長為代表的封建父權制度與琴琴之間的衝突，也以第三人稱敘述者的口吻處理，損害了感受的真實性。夾在封建性和現代性之間痛苦不堪的女性經驗，只能淪為「奇譚」水準而已。即令如此，這篇小說透過具有主體性自我意識的新女性，反抗封建父權權威，堅定追求自由選擇婚姻對象，反映了當時新女性的艱難處境和嘗試突破困境的努力。

如上所述，男性作家所刻畫的新女性面貌，多已具備先天性自覺的強韌面貌；但與此不同，日據時期女性作家所描寫的新女性，反而是接受現代教育後，擁有覺醒的追求自我；卻身處在封建觀念的囚牢裡，內心感到苦悶和徬徨。其中，楊千鶴的〈花開時節〉（1942），就像小說題目一樣，描述的是眼前就要自女學校畢業的一群女性對社會和婚姻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故事。這一群女性，雖然受到以培養賢妻良母為主要目標的高女教育，但透過現代學校教育，這些女性多少產生了追求自我及遠大抱負的理想。因此，隨著畢業的時間越迫近，面對馬上就要步入婚姻之途的現實，不得不省思自己的意願和未來。她們的苦悶和徬徨，來自於是否要接受父母所安排的婚姻，按照既有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度過人生。小說環繞著這個主題，描述這群少女對婚姻既期待又恐慌的複雜心緒。

主人公惠英眼看著同學畢業後一個接著一個走上結婚生子之路，唯有她仍舊堅持自己來決定生活方式，走出社會尋找工作機會。但她不久即受到家中要求出嫁及各種或明或暗的社會壓力，而返回家中安居待嫁。小說雖以不必擔心衣食問題的一群浪漫少女為主人公，描繪她們剛萌芽的朦朧的女性意識。但是這些少女好不容易找到的個人小

小願望，卻在面對家庭和社會的封建價值觀和制度時，被迫放棄個人理想。小說描繪這些女性心境轉變的過程，披露了在封建和現代之間擺盪的時代實際感；尤其是以女性小說的角度來看待這篇作品，可以看出她把這些人物的心理狀態刻畫得真實細膩，例如，少女時代的結束及進入婚姻階段的女性特有的害怕與不捨，以及茫然的憧憬與不安等複雜心理，就刻畫得逼真深入，絲絲入扣。

如同呂赫若和楊千鶴一樣，張碧華也在小說〈新月〉（1934）中描寫畢業自女學校的新女性玉惠爭取婚姻自由的過程。玉惠所面臨的困境，是由於喜歡上家中佣人高進原之故。他是個具有崇高理想和上進心的知識青年，同時也是社會主義者；他們的愛情是在互相尊重的人格基礎上成立，也符合具有獨立個性的主體性個人追求自我的現代價值，然而卻遭到玉惠父親的堅決反對。玉惠父親甚至利用雇主身分，逼迫高進原娶家中下女。小說中，母親了解玉惠的強韌意志，並贊成女兒的選擇，揭示出如「新月」般有希望的未來而結束，其中關鍵的因素為玉惠母親秀村的不幸婚姻。母親的婚姻是典型舊家庭制度下的犧牲例子，在小說中與玉惠所追求的自由婚姻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秀村原本是大地主的閨女，聽從家裡安排的所謂「門當戶對」婚姻。婚後不久，丈夫娶進兩房小老婆，從此秀村的生活掉入無限的痛苦深淵之中。特別是在最後進門的藝妓秀琴生出兒子後，其威勢氣焰幾乎到達要逼迫秀村離婚的程度，沒有生子的秀村無法忍受這種侮辱和蔑視，決定離婚而回娘家商量，可是卻碰到齋堂的反對，終究無法如願。秀村她的一生完全跟自己意志無關，而全由他人代為決定。因此，小說中出現母親答應玉惠婚姻的情節，正是控訴封建婚姻。

母親知道玉惠力求婚姻自主，從原本「討妾是男人的常態，女人不允許有這種自由」歎息的態度，突然轉變為「為了你，人家嘲笑

也不算什麼」。在這裡明白表現出，母親這位封建舊女性，能夠不顧他人指指點點的冷眼嘲笑，跳脫過去的苦痛，肯定新女性的自由意志和婚姻自由，並在女性覺醒的前提之下，昇華為姊妹情誼。小說中雖未寫到他們的愛情是否有結果，但在象徵希望的「新月」照亮之下談情說愛的結尾，暗示著得到母親的認可，很快即可獲得婚姻自由的期待。

女性即使如此力求自主婚姻，但如果基本的生活條件得不到保障，那麼女性壓抑仍然存在。葉陶的〈愛的結晶〉（1936）刻畫自主婚姻的新女性所面臨的另一種困境。小說人物素英原本是女學校的教師，由於撫養雙親而錯失婚姻機會，後來遇到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先生，經由自由戀愛之後結婚。後來，先生為社會運動辛苦奔波，不幸得了肺病後無法進食，整天無所事事，因此所有的生活負擔全落在素英身上。素英再怎麼努力到外面找工作，卻仍然三餐不繼，小孩也因營養不良甚至眼盲。素英在嚴酷的生活壓力之下，無法保護由自由戀愛所獲得的結晶——小孩，面臨著母性喪失的危機。

另一個人物寶珠則是有錢人的千金，她帶了巨額二千圓的嫁妝，為成就父親的目的嫁給一個股長，但不久先生便開始在外面尋花問柳。在封建秩序的巨大壓力之下，寶珠只能忍氣吞聲地過日子，不過當她知道先生傳染梅毒，造成生下小孩變成白痴的悲慘事實時，終至崩潰倒地。小說舉出雖由不同原因引起，但同樣都是因無法保護小孩而面臨喪失母性的危機的女性處境，來彰顯日據時期各階層女性，或因封建秩序，或因生活壓力而受到壓抑的情況；並且在結尾處描寫兩位女性互相訴苦之後得到心靈安慰，體現了困境當中女性之間緊密相連的意識與溫暖的情感。

## (二) 日據時期韓國小說中的新女性

1920年代的韓國新女性，可以說是最早受到現代文明洗禮的一群；她們所建構出來的有關新女性的論述，也成為當時的主流論述之一。因此，新女性可以說是表現先進性和現代性的一種符號。在此情況下，許多作家乃創作出數量可觀的新女性小說。在此，我將挑出幾篇具代表性的小說，分成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兩方面來探討新女性的自我追求歷程。

在男性作家當中，一般認為開啟韓國現代文學之路的金東仁和廉想涉，在他們的初期短篇小說中，最喜歡刻畫新女性的生活和心理。金東仁的〈弱者的悲哀〉（1919），描寫19歲貧女伊莉莎白在K男爵家中當家庭教師時，被男爵性侵害之後，她歷經懷孕、被趕出門、提出訴訟、敗訴、墮胎等一連串過程，終於覺悟女性為弱者這一事實。而廉想涉的初期作品〈除夜〉（1922），則以書信體形式寫成，描述曾留學日本的新女性貞仁，得到先生諒解她的外遇消息之後，反而受不了良心的苛責而決定自殺。小說分成兩個部分進行，前半部主要對當時的婚姻制度和封建的、父權的社會提出批判，以及陳述貞仁的自我中心結婚觀、新的貞操觀；後半部則追蹤貞仁外遇事件的真實情形。

在這些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女性人物係處於父權不在，或對父權有強烈反抗心理的狀態：伊莉莎白為孤兒，在沒有父親的家庭中成長，她跟當時的新女性一樣，夢想著自由戀愛，但她的夢想來不及實現，就已經被經濟上代理父親角色的K男爵侵犯；而貞仁則直接批判「父親的父權濫用和暴君般的威壓」，並從中找出自己偽善行為的原因。

在這種父權不在或否定父權狀態之下，吸引她們的就是當時流行的自由戀愛。伊莉莎白喜歡上常在路上遇到的李煥，並對他產生愛意，但是她跟李煥之間實際上並未發生任何事情，李煥這個人物在小說脈絡中也完全被排除，因而女主角對他的感情是無法實現的，只不過是一種虛幻的假慾望而已。她的這種慾望，在被男爵性侵害之後也同樣出現過，她雖然後悔自己過於軟弱而沒有強烈拒絕男爵的強求，但另一方面，每次男爵要跟她親熱的時候，她也沒有明白拒絕；男爵離開之後，她反而感到「無限的寂寞」，甚至偶而還有「男爵不來，還真讓人感到急躁不安和嫉妒」的想法。男爵和伊莉莎白的關係，並非自由戀愛，而是由常民和貴族的階級差異、被雇用人和雇用人的關係等經濟差異所產生的性暴力。即使如此，她也沒有認知到自己變成男爵臨時性玩偶的事實，反而夢想著哪天成為男爵後妻，以補償眼前不幸遭遇的損失。

伊莉莎白如此渴望自由戀愛，但對自由戀愛本質的認知，卻處於非自覺狀態，其原因在於她跟產生愛意的男性對方之間，完全沒有感情的交流管道，所有跟對方相關的敘述，都是由伊莉莎白以第一人稱方式敘述，可見小說中呈現的是很典型的觀念性自由戀愛思想。

另外，〈除夜〉中的貞仁強烈反對既有道德價值，充滿著「充足自己人生的慾望」，她設定了自我中心的世界觀，把生活和戀愛劃上等號。如此，基於人生和戀愛一致的想法，提出的戀愛至上主義，就是正面否定既有的貞操觀念。她把父權社會對女性要求的貞操，解讀為「男性以生活保障為條件強制要求女性順從，來滿足所有的慾望」，或「男性要滿足高尚興趣的慾望」。這些觀點認為男性中心的倫理中產生貞節意識形態，以及貞節根柢含有性（或肉體）和物質之間的交換這個經濟邏輯；在小說中，貞仁面對自己的戀愛和婚姻，也是同樣

採取條件交換的方式進行，即使在結婚之後的戀愛行為，也不是主體個人之間的自發性結合，而是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滿足潛在欲求的媒介。也就是說，她之所以會跟外面的男人在一起，與其說是對他們產生了愛情，不如說是內心隱隱期盼他們能提供她留學德國這個潛在誘因。這說明貞仁真正想要的並不是自主個人與自由戀愛，而只是泛泛指望著當時新女性的美好形像。這種假慾望在〈弱者的悲哀〉中也同樣出現。被男爵趕出門的伊莉莎白來到鄉下的遠方親戚家落腳，但她內心不斷想念的卻是漢城（首爾）這個大都市和漢城的人們。這些情節告訴我們，作者想要表達出，所謂新女性追求的並不是自己內心真正的慾望，而是要追求他者所欲求的東西，究其原因，應該是在於企盼得到他者認定的慾望上面（權澤榮譯，1994: 16）。就這些小說中的新女性來講，所謂他者，乃是沒有實際化的新女性形象，以及以日本、西方（〈除夜〉），或漢城（〈弱者的悲哀〉）為代表的顯現於外的現代文明而已。

伊莉莎白和貞仁在父權不在或抗拒父權的情況下，冀望成為新女性卻遭受挫敗。這些女性的失敗原因，在於她們只有似是而非的新女性意識。她們雖然嘗試追求成為自律性的個人，但是對她們來講，新女性只是接受新教育，謳歌自由戀愛的女性，如此而已。她們沒能認知到，表面性現代文物或思潮背後隱藏的封建秩序的強大力量，甚而會對女性更加殘酷。

另外，這些人物的失敗和急速沒落（伊莉莎白的敗訴和流產；貞仁的自殺），代表的是她們又回到了她們原本急欲否定的狀態，也就是回到父權制度的壓抑性秩序中。這裡必須注意的是，男性作家在描寫新女性的挫折過程當中，會摻入男性的聲音：例如描寫伊莉莎白和貞仁等新女性的過程中，都把她們描述成只會追求流行，戀愛輕浮隨

便的放蕩面貌；在這裡，他們把新女性的生活描寫成時代中淪落的風俗或世態，可以看得出作者隱藏的意圖依然是倫理的、規範的態度和標準，這就使得小說裡的女性人物無法達成和諧的狀態。

不僅如此，〈弱者的悲哀〉在女性心理刻畫上也嚴重缺乏寫實性（宋明熙，1993：140-141），而且作者的過度介入也損害其敘事性。〈除夜〉雖採書信形式敘述，並把告白主體設定為女性，但內容中不斷地出現否定自我的評論，在閱讀過程當中便讓讀者不時想起男性作者的聲音。這些隱藏作者的介入和評斷，容易誤導讀者以為新女性具有性放縱、虛偽意識、似是而非的現代意識等負面形象，再加上小說又以新女性經過反省（覺醒和自殺）之後，再度回到傳統的性價值觀的方式處理，暴露出作者的封建意識形態。

與這些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筆下的新女性，大部分都是處於封建價值觀崩盤和現代精神尚未確立的過渡時期女性，而她們的書寫態度也與男性作家截然不同。這些作家主要有金明淳、羅蕙錫、金一葉等第一世代女性文人。由於金明淳的母親原是藝妓，從小即受到世人蔑視的她，透過作品寫出了自己的個人生活經驗與感受。在〈彈實和珠英〉（1924）、〈暮然回首〉（1924）、〈疑心少女〉（1917）等小說中，她徹底反對成為傳統女性，極欲革除舊制度與舊習慣，並把實踐此目標的主人公都刻畫成反抗性人物。她的大部分小說人物，皆努力追求新的女性自覺，拒絕扮演傳統的性和愛情等封建婚姻制度下的女性角色和女性生活。

例如，〈疑心少女〉描寫在男性秩序中被犧牲的母女。母親知道自己的先生在外面尋芳問柳，不同於傳統女性百般忍耐，她選擇以自殺的手段提出抗議，女兒因此過著不幸的生活。〈處女之路〉（1920）的女性人物為了維護自己的愛情，抵抗家庭安排的婚姻而離家出走。

金明淳小說當中幾乎看不到正常的夫妻關係，這也表露出作者以負面角度看待舊式婚姻制度。她先設定不理想的家庭關係，然後塑造一個抵抗此關係的人物，來重新提出新的愛情觀。由此可見，作者目的在於揭露當時不合理的家族制度矛盾，以提倡新的女性意識。

其中，她提出以獨立自主的個人主體之間的結合（愛情），作為能夠擺脫既有支配秩序可能性的觀點，例如〈我正在戀愛〉（1926）、〈暮然回首〉、〈像陌生人一樣〉（1929）等小說當中，她把自由戀愛當作能夠救贖不幸女性的通路。這些小說不僅安排了許多已婚男／未婚女、已婚女／未婚男、已婚男／已婚女等不正常的愛情關係，登場的人物也沒有感到罪惡意識，足見它反映的是只有自由戀愛才能解放女性的作者想法。<sup>11</sup>

雖然金明淳小說，並非以日常生活中人物的互動和人物之間的關係網來進行塑造呈現愛情，而是以人物對此感受不到任何衝突，一定要得到慾望的完美標準方式呈現。不過愛情終究是女性追求自我認同的通路，愛情本身讓人暴露自己，透過它能讓人得到新的自由，進而可以形塑成一個完整的人。如此理想的愛情，在金明淳小說中都遭到失敗，這反映出封建秩序仍然發揮著強大的力量，也因此小說更顯現出它的寫實性。

羅蕙錫是韓國最早的女性畫家兼文人，她與金明淳一樣主張女性解放，並透過〈慶熙〉（1918）等四篇小說，刻畫了理想的新女性形象。最具代表的小說〈慶熙〉，主要描寫在東京留學的主角慶熙在放假期間回到家之後，碰到周邊許多尚有父權思考的人物，而以言行來試圖扭轉他們對女性教育和新女性的偏見，讓他們知道新女性肯定積

11 這些開放的女性形象，以及新的愛情觀係受到當時流行的艾蘭凱兒（Ellen Key）思想影響（金福順，1992: 57）。

極的一面。小說分為四章，它利用大量的對話呈現各個人物的不同意見。第一章敘述慶熙積極又勤勉的生活態度，顛覆了親家母舊女性的封建思考；第二章描述三個人物看到慶熙處理家事的能力之後，變成熱烈欽羨新女性；第三章探討婚姻問題，間接呈現主人公與父親對立的態度；最後一章則描述之前一直扮演教導性角色的慶熙，其實在舊時代價值觀和新的現代意識之間，仍然存在選擇的內心掙扎。慶熙知道新女性的路途非常艱難，而且她也深知傳統女性角色也有它許多正面的因素。小說的展開過程，一步步地突顯新女性邏輯思考及付諸實踐的積極面，很自然地強化了女性受教育的正當性。

由此看來，慶熙具有舊時代價值和新價值之間的對立人格，小說以後者說服前者，再以迂迴的方式呈現新女性優越的一面。在這個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當是作者重視女性之間的姊妹情誼：小說中母親完全認同慶熙的想法和行為，面對親家母、父親等具有封建思考的人，她膽敢為女兒講話並代理女兒扮演啟蒙角色；另外，親家母、嫂子、鄰居、商人等其他女性人物，也能夠肯定慶熙，並接受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如此，慶熙這個女性人物，不同於前述男性作家所刻畫的被動性女性，她屬於能改變現實的積極性人物，具有開放性和包容力，且能促使周遭人物與她形成姊妹情誼。不僅如此，這篇小說出現的父親和哥哥兩位男性，最後也願意幫助及諒解慶熙。慶熙的喜劇收場，即來自這些開放性男女人物的協助，慶熙的意志才得以實現。通篇小說可以說富有啟蒙主義性格。

另外，以豐富的自傳性取勝的金一葉，留下了許多女性解放理念的小說。小說中登場的女性，幾乎都是自立性強，並從舊倫理中自我解放的新女性；相反地，男性人物反而優柔寡斷、缺乏責任感。小說以安排獨立女性和懦弱男性性格並存，非常適合批判社會制度的男

性中心主義，進而傳達新女性正面的形象。不過，小說中大部分的女性都被男性戲弄、糟蹋或犧牲，例如〈順愛的死〉（1926）、〈斷腸〉（1927）、〈少女的死〉（1920）中的女性人物，由於分別被認識的男人強暴、被先生遺棄，或被父母販賣而尋求自殺，但她們都留下遺書或以投書方式向世人昭告自己的遭遇，公開地攻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從以上三位女性作家創作的小說，我們可以看出現代初期韓國新女性的自我認同過程，雖然大部分都告失敗，但透過自由和理想愛情以追求自我主體的自主性，三位作家都展露了她們肯定視角與積極的一面。

### 三、社會底層女性的困境與出路

#### （一）日據時期台灣小說中的社會底層女性

從 1895 年開始，日本共花費了 15 年的時光，調查台灣的人口、土地及生活習慣，並建立度量衡與貨幣制度、維持治安、驅逐外國勢力，終而完成建設資本主義殖民地地區的基礎作業。日本在台灣實施的資本主義，其發展形態乃是以日本人大企業為主的獨占資本形態，是故到了二〇年代，八分之一的台灣土地已落入日本資本家所經營的新式製糖公司之手，而原住民擁有森林的既得權益也遭到剝奪；不僅如此，會社令的公布，更限制民族資本家的成長。因此，二〇年代台灣的各项產業皆面臨由日本資本家獨佔的局面。<sup>12</sup> 由於日本獨占資本形

12 有關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請參考（周憲文譯，1985）。

態的資本主義發展，因而在台灣社會形成嚴重的階級對立和民族對立現象，兩者甚且錯綜複雜地相互糾結。因此，社會上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和不適應狀況，多半與民族及階級矛盾有著相當大的關聯。

在殖民支配結構中，依階級分化而衍生出的農民、勞工等無產階級的貧窮問題嚴重——特別是處於最低層的、無產階級女性的處境最為可憐。這些女性因屬於無產階級而遭受壓迫，同時也因為身為女性，成為被迫害的對象。楊守愚的〈鴛鴦〉（1936）描寫女性勞工鴛鴦因家貧到農場做工，卻成為日本人農場監督性侵害的對象，因而家庭破碎。鴛鴦的先生阿榮在製糖公司做工，在搬運甘蔗途中被蔗車輾斷左腳以後，太太就代替他到農場工作。媽媽和太太不在的家裡，嬰兒肚子餓的哭聲，以及先生疲倦的歎息聲，共同譜出了這個悲悽的樂章。

有一天鴛鴦在結束工作後，受到日人監督工的要求，前去幫忙做飯，不幸卻在宿舍裡遭他灌醉而受到侮辱。她滿心懊惱無奈地走回家，卻又被先生誤以為偷漢子，因此傷心至極。最後她還是得不到丈夫的諒解，並被逐出家門，而殘廢的阿榮也被火車撞死，結束了悲慘的一生。楊守愚透過貧窮勞工女性的悲慘遭遇，訴說殖民地女性受到性別和階級雙重壓迫的社會事實。尤其他將蹂躪鴛鴦的人，設定為日本人農場監督，一方面反映出當時類似的社會事件，<sup>13</sup> 另一方面也控訴了殖民者男性壓迫被殖民者女性的橫暴。

除了〈鴛鴦〉以外，因貧窮和性別差異而走上悲劇一途的女性，也出現在賴和的〈可憐她死了〉（1928）、楊守愚的〈女丐〉（1928）、楊逵的〈水牛〉（1928）、繪聲的〈秋兒〉（1935）、楊華的〈薄命〉

13 有關日本男性和台灣女性之間的種種性問題，在《臺灣民報》的報導中經常得見。

(1935)和廖漢臣的〈玉兒的悲哀〉(1935)等作品中。在這些以探討女性問題為主的小說裡，她們的施暴者，往往不是地主等資本家階級或日本農場主，就是封建禮教舊觀念；可以說，與其他現實主義小說一樣，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複雜交錯地糾葛在一起。〈可憐她死了〉中的阿琴因貧窮被賣去當童養媳，在一連串的不幸之中，又遭到有錢的好色之徒欺負，最後以自殺結束了一生。她的慘劇起因於地主任意地收回耕作地和官廳的強制督促戶稅，然後又碰上用錢買賣婦女的有錢男性的貪慾，可見阿琴的悲劇同時來自地主、官廳和資本家的侵犯。同樣以自殺結束生命的，還有楊守愚〈誰害了她〉(1930)中的阿妍；她的父親原本在工場做工，被機械輾斷腳成為殘廢之後，母親也到農場當女工，不過母親卻因操勞過度、營養不良而亡；阿妍為了家人生計，只好去工廠做事，但農場監督並未放過她。另外〈女丐〉中的明珠年幼時失去母親，跟著嗜賭如命的父親成長，十一歲時明珠被繼母賣去落入紅塵，最後卻因罹患梅毒無法接客而淪為乞丐。她的悲慘下場，全是因為父親存著養女無用的封建舊觀念，以及鴇母的貪慾所致。〈瘋女〉(1929)中的紫鳳，雖然知道自己要嫁的是個無賴漢，卻無法抗拒母命，因而陷入苦悶終致發瘋。她是一位資質聰穎的女孩，本想要求母親解除婚約，「但在青面獠牙，手執鐵鍊的禮教之前，教她從哪裡生出這一股勇氣呢？況且自身還有被養成的虛偽造作的羞恥心在牽制她」，因而自怨自艾，終究受不了而精神異常，一輩子流浪街頭。另外，〈秋兒〉中的秋兒因家境貧苦，先生到都市賺錢，自己則幫人家洗衣度日；一天家裡接到通知，指其先生因違反治安維持法入獄後身亡，秋兒因此開始受到鄰居異樣的眼光，過著悲慘的生活。這篇小說反映當時處於森嚴的日警監視下，一般老百姓的人心都已變質的疏離社會。當時的這些女性，在日帝的迫害、同族的蔑

視，以及貧窮等痛苦的壓迫下，輕易地就陷入不幸的深淵。

此外，〈玉兒的悲哀〉以淡淡的筆觸描述玉兒愛上從小一塊長大的地主兒子，但有錢的地主兒子升入高等學校後，與其他女學生交往，又準備到日本留學，而玉兒自己則為了貧窮家中的生計，不分晝夜地做事；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父親也打算把她嫁給出錢較多的男人，如此懸殊的貧富差距現實，使得夢想著美麗人生的玉兒感到心碎。當時的女性因家庭貧窮而被拿來當作商品買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社會的縱容之下，公然買賣人權的童養媳制度即是其中一例。年幼時被賣為童養媳的少女，在未來的婆家中，受盡苦勞，嚐盡辛酸，一旦到了適婚年齡，屬於有產階級的丈夫卻已充滿自由戀愛新思想，而不願接納童養媳；於是童養媳往往被迫嫁給另一底層男子，在勞動之中度過一生。如果少女一開始被賣到貧窮的家庭，即使順利結婚，但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夫妻關係，卻又不怎麼理想。因此，這些童養媳的問題，變成當時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sup>14</sup> 在〈薄命〉中，愛娥就是年幼時被賣去當童養媳的女性。她從小失去母親，受到繼母的各種虐待，之後因父親賭博欠債而被賣掉，過的同樣是暴力凌虐的生活，終至無法堪受而逃離出來。自小即在受虐冷待的環境中成長，使得愛娥雖然年幼，卻具有成人一般的眼神；到了十六歲，父親又因缺錢再度把她送回婆家，婆家人的毆打和謾罵，仍然未曾稍歇；愛娥就在過度的勞動中，瘦得不成人樣，最後在分娩之後發瘋，不久辭世。由此可知悲慘的一生強諸愛娥的精神刑罰有多麼的嚴重。

在家庭或農場中遭受人權蹂躪與性侵害的這些女性人物，所呈現的是在殖民結構最底層呻吟的無產階級女性的普遍樣貌。她們用眼

---

14 當時有關婦女問題的文章，可參考（許俊雅，1994: 355-358）。

淚和歎息，勉強度過暗淡憂鬱的時光，她們是那種藉由自殺或精神異常，摸索著精神出口的絕望型人物；只要這些人物的絕望存在，新時代的曙光對她們來說就遙不可及。綜觀以上分析，可知這些探討女性問題的小說所揭示的普遍特徵是，父親或先生的不在或無能。這些男性因死亡、或身體殘缺、或沉溺賭博，而處於失去經濟能力，因此，太太或女兒必須代替他們為生計奮鬥，但卻面臨悲劇性的後果。父親的不在，說明家庭的位階秩序崩潰，以及家庭道德觀遭到破壞，導致失去生活的目標。失去國權的殖民地男性，等於失去了主權；男性能力受到損傷，加上日帝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壓迫和毒害，使他們無法正常過活。這些父親或男性的不在狀況，暗示被殖民男性的處境。小說中安排父親的不在，以及他們男性能力的喪失，就是象徵著當時殖民地台灣人共同經歷父親不在的時代，同時也是父親這個角色無法發揮的時代，更是一個喪失了目標的時代。特別是小說描寫男性能力的失去，直接導致女性淒慘的下場，呈現出這個不正常時代的面相。男女之間角色顛倒，意味著當時男性無法積極行動，同時也訴說著殖民地社會環境的惡劣。因此，小說刻畫這些因貧窮、性別差異、殖民者男性的橫暴和封建禮教的束縛而沒落的女性，其意圖在於呈現資本主義擴散所帶來的貧富差異——階級問題，以及全體殖民地台灣人的抑壓——民族問題。

## （二）日據時期韓國小說中的社會底層女性

與殖民地台灣的底層女性處境相比，日據時期韓國下層社會的女性問題當中最為嚴重的當是貧窮問題。女性作家姜敬愛是其代表作家，而其大部分的小說內容，講述在極端的貧窮當中受苦受難的女

性。姜敬愛雖然未直接呈現女性獨特的心理等女性問題，但詳盡地描繪殖民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受苦的女性，呈現當時無產階級女性的處境和自我認同。這點極適合與前述台灣底層女性的問題進行參照了解。

姜敬愛大部分的小說背景為 1930 年代——一般認為這個時期是韓國民族貧窮加速的時期（宋仁和，1992: 251-289）；而小說空間敘述的貧窮狀況，更是達到讓人無法置信的程度。這些極限的貧窮狀態，是造成女性——特別是下層女性——無法維持做人尊嚴的主要原因。小說中的許多女性，由於貧窮，不得不與所愛分開，有的被賣去成為有錢人洩慾的對象，嚴重者無法發揮母性愛，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孩子死去。

〈母親與女兒〉（1931）描寫的是母女二代女性的受難和解放。靚女是貧窮佃農的女兒，長大之後被賣去當地主的小妾，但沒過多久即因地主家庭的蔑視和虐待，而被迫帶著剛出生的女兒回到娘家。小說以此事為發端，她的父母親和弟弟後來又相繼死去，造成靚女為生活所逼，終至淪為妓女。靚女的淪落原因，可說是來自貧窮環境加上地主的剝削所致，地主李春植使盡各種手段沒收佃農的糧穀，以致佃農必須背上龐大的債務；然而地主卻又用搶奪來的財產，買進妓女、小妾，過著放蕩的生活。在這裡我們發現下層民的貧窮問題，不只是單純的現象問題，而應該連接起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階級矛盾；因此，女性被壓抑的事實，必須從社會結構當中來進行觀察。

農民和女性的這些悲慘狀況，雖可直接歸因於地主的非人和橫暴行徑，然而由於地主背後有殖民統治階級的支持，無寧說這是因殖民統治這個社會結構性的因素所促成。日據時期的韓國農村社會已脫離了封建地主與佃農（所有權與耕作權）的關係，此時土地的使用權已經一元化（只有所有權得到認定），因而產生了生產者（農民）和

生產手段（土地）分離的現象，這種情況被稱為半封建地主制。而在這個制度的背後，則存在殖民統治的經濟榨取。日帝為了增加稻米產量，並有效地奪取米穀的產收利益，乃在韓國支持不公平的地主制度——地主對佃農行使口頭契約、縮短契約期間、過度徵收佃租等獨占權利，可說是掌握了佃農的生殺大權。靚女的悲慘情況，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發生。

資本主義的矛盾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貧窮，進而暴凌女性，在姜敬愛的代表作長篇小說〈人間問題〉（1934），全面性、系統性地探討貧窮與暴力。小說以農村和都市的二元化空間為背景，描寫整體環境毀滅農村少女宣妃的人生。在農村，宣妃的悲劇或許能以父母雙亡和地主性侵兩件事情來概括：地主德浩逼死宣妃的父母，又強暴宣妃，逼她受孕。他除了貪戀宣妃的美色之外，也想藉宣妃得個子嗣。因此造成宣妃發生悲劇的原因，在於資本的邏輯和扭曲的慾望。小說中除了宣妃以外，還有不少其他農家婦女為了糊口賣身的場景，可見貧窮對女性造成的嚴重性傷害。

在農村受到地主侵害的宣妃，搬到都市後，又進入了另一種層次的壓迫之中。在仁川的紡織工廠就業的宣妃，不僅得在危險的工作環境裡賣命勞動，即令如此三餐仍然難以為繼；工廠以儲蓄為藉口，剝削了勞工的薪水不說，領班又不時地對她性騷擾，終於迫使宣妃在長期嚴重營養不良等惡劣條件下得病身亡。在此我們可以看出，階級矛盾和性別矛盾同樣在都市與鄉村裡發酵蔓延。從農村地主的橫暴和家庭的貧窮，以至都市裡勞動力的被剝削和領班的性虐待，宣妃的一生就在全面性社會矛盾當中悲慘地結束。她是三〇年代代表貧窮佃農女性的形象人物，從農村到都市，資本的邏輯可以說是壓迫下層階級女性的最大禍首。

姜敬愛的小說，不止訴說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造成女性性的桎梏，還刻畫了貧窮剝奪女性作為母性基本權利的悲劇性。她的小說〈鹽巴〉（1934）以間島為背景，述說失去丈夫和一個兒子的女性，在被地主強暴趕出門之後，為了養活其他孩子，不得不成為別人家的乳母；但很諷刺的卻因這個原因，她又必須面對失去剩下兩個小孩的痛苦。貧窮造成母性愛喪失的內容，在〈母子〉（1935）、〈地下村〉（1936）等其他姜敬愛的小說中反覆出現，可見姜敬愛的小說視貧窮為全面破壞女性、壓抑女性的最主要原因。

除了貧窮，造成女性受到壓抑的原因，尚有男性的背叛。自私的男性純為自己的利益，拋棄了純情奉獻的女性。這些以男性背叛女性為主要內容的小說，控訴男性中心社會，以及對自私貪慾男性的告發。不過，姜敬愛的小說並沒有集中探討父權制度的矛盾，父權制矛盾在她的小說中，固然是反復出現的一種類型，但卻只是她所認知的壓抑女性的次要原因而已。〈母親與女兒〉、〈同情〉（1934）等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雖感受遭男性拋棄的苦痛，但卻不至於到自我毀滅的地步。可見在作者的認知中，階級矛盾才是壓抑女性的首要原因。

依此而言，姜敬愛提出的女性解放展望，是透過階級解放實現。她在小說中一再地鋪陳這樣的過程，原本不知道現實矛盾所在的女性，透過一些契機終於獲得階級認同，進而對自身的階級處境和社會變革有所覺醒，最後投身社會主義運動而確立了自我主體性。小說中女性的階級覺醒和自我認同的過程幾乎重疊，例如〈母親與女兒〉中，舊女性目睹社會運動家為了勞工階級鬥爭卻被拉走的場面，而開始努力擺脫隸屬於先生的被動屈辱角色的生活，才確立了自主性；〈鹽巴〉中女性主角冒著生命危險走私鹽巴，在警察奪走她的鹽巴的那一瞬間，她想起共產黨的演說，而體認到自己的階級處境；〈人間

問題〉的宣妃也同樣對自己的階級處境有了醒悟，她終於理解到壓迫自己的是地主和紡織工廠，得以有了自我意識的個人重新誕生，可見作者想主張階級覺醒才是通往女性解放道路的思想。像這樣在階級解放的範疇裡提出女性解放的展望，對下層女性來講，是個相當可行的作法；只是她的小說鮮少指出男性中心社會的不當性，美化家事勞動，設定夫妻關係為命運共同體，太太總是毫無懷疑地跟隨著先生的意思，父權制度的矛盾似乎在姜敬愛眼中並不那麼的明顯。

#### 四、結語

以上，我以日據時期的台灣和韓國的小說作品為對象，觀察了該時期兩國小說所呈現的女性處境。這個時期為兩國進入現代的過渡時期，並且是在異民族統治底下發展殖民資本主義的時期。1920年代前後，兩國分別以文化啟蒙抵抗日本統治，也積極地接受西方現代精神和合理主義，以求創造新文化，進而建立富強的現代國家。由於啟蒙肯定個人自由和理性，以及平等思想，因此當時被封建舊制度和帝國主義異民族壓迫而受到苦難的女性問題，乃成為必須優先改善的課題。

在此時代精神之下，本文分為新女性和社會底層女性來考察小說反映的女性處境。經過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小說大部分是以對抗封建舊家庭制度和男性中心價值體系，而爭取自由戀愛和婚姻自由為其主要內容；而刻畫社會底層女性的小說部分，則在女性被壓抑的原因上面，舉出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所帶來的剝削為其主要內容。另外，韓國男性作家金東仁和廉想涉筆下的新女性，沒能真正覺醒自我，大部分的女性人物都只是在跟從表面現代性，在遭到挫敗之後，又回歸

到封建秩序裡，她們的失敗和挫折遂成為確立封建性的合理化手段。台灣的情況則與此不同，呂赫若所描寫的新女性形象，是個具有堅定意志的鬥士型人物，她對抗封建性終至得到勝利，只可惜在人物心理描寫上稍嫌薄弱。如此，兩國的男性作家所刻畫的新女性形象，都是沒有具體個性的個體，只是偏重於觀念傾向而已。

與此相反，女性作家所呈現的兩國新女性大部分都有濃厚的自傳性格，並帶有強烈的女性意識。作者逼真地刻畫她們在封建性和現代價值之間徬徨、苦悶，並透過自我覺醒和姊妹情誼來對抗封建秩序的面貌，強烈控訴父權制度的不合理。這些受過新式教育的新女性，試圖在一般家庭男女有別的封建觀念，以及在不夠成熟或開放的社會中，施展理想抱負，或者探索自我、實現自我。她們也體認到，這是一條至為艱辛的道路。

處於社會底層的女性，無論台灣或韓國，都是在由殖民者、資本階級和男性構成的社會結構中，受到民族、階級、性別的三重壓抑。這些農民和勞工階級女性的悲慘情況，具有代表殖民地台灣和韓國的總體現實性質，因此在了解日據時期女性處境時，它更是不能忽視的一環。

由於台灣和韓國具有如此類似的現代歷史經驗，其文學發展過程和內容也有相當部分重疊，因此了解韓國文學的進展及內容，以作為研究台灣文學的參照系統，是有其絕對的必要性。因為唯有如此，不僅可增進兩國之間的相互了解，同時也能對過去歷史有所反思，相信藉此也可以展望未來文學之路的走向。

## 參考文獻

### 一、資料

- 王敏川（1920）〈女子教育論〉，《臺灣青年》，1(3): 41-43
- 呂赫若（1935.7）〈婚約奇譚〉，《臺灣文藝》2(7)。
- 秀湖（1924.2.21）〈婚姻制度的進化概觀〉，《臺灣民報》，2(3)。
- 金一葉（1920a.4）〈我們理性的要求和主張〉，《新女子》。
- 金一葉（1920b.4）〈少女的死〉，《新女子》。
- 金一葉（1921.2.24）〈近來的戀愛問題〉，《東亞日報》。
- 金一葉（1926.1.31-2.8）〈順愛的死〉，《東亞日報》。
- 金一葉（1927.1）〈斷腸〉，《文藝時代》。
- 金東仁（1919.1.1）〈弱者的悲哀〉，《創造》。
- 金明淳（1917.11）〈疑心少女〉，《青春》
- 金明淳（1920.3）〈處女之路〉，《新女子》。
- 金明淳（1924a.6.14-7.15）〈彈實與珠英〉，《朝鮮日報》。
- 金明淳（1924b.3.31-4.19）〈暮然回首〉，《朝鮮日報》。
- 金明淳（1924c.3）〈在春天的街頭〉，《新女性》。
- 金明淳（1925.7）〈理想的戀愛〉，《朝鮮文壇》。
- 金明淳（1926.1）〈我正在戀愛〉，《東亞日報》。
- 金明淳（1929.5）〈像陌生人一樣〉，《文藝公論》。
- 姜敬愛（1931.8-1932.12）〈母親與女兒〉，《彗星》。
- 姜敬愛（1934a.8.1-12.22）〈人間問題〉，《東亞日報》。
- 姜敬愛（1934b.2, 5, 9, 10）〈鹽巴〉，《新家庭》。
- 姜敬愛（1934c.10）〈同情〉，《青年朝鮮》。
- 姜敬愛（1935.1）〈母子〉，《開闢》。

- 姜敬愛（1936.3.12-4.3）〈地下村〉，《朝鮮日報》。
- 陳英（1920）〈女子教育之必要〉，《臺灣青年》，1(2): 19-20。
- 黃璞君（1920）〈男女差別撤廢〉，《臺灣青年》，2(1): 34-36。
- 陳崑樹（1921）〈根本的婚姻革新論〉，《臺灣青年》，3(6): 23-31。
- 張碧華（1934.6）〈新月〉，《福爾摩沙》，3。
- 廉想涉（1922.6）〈除夜〉，《開闢》。
- 葉陶（1936.2）〈愛的結晶〉，《臺灣新文學》附屬刊物《新文學月報》，1。
- 楊千鶴（1942.7.11）〈花開時節〉，《臺灣文學》，2(3)。
- 楊守愚（1931.1.10、17）〈女丐〉，《臺灣民報》，214。
- 楊守愚（1929.12.10）〈瘋女〉，《臺灣民報》，291。
- 楊守愚（1930.3.15、22）〈誰害了她〉，《臺灣民報》，204, 205。
- 楊守愚（1934.12.16）〈鴛鴦〉，《臺灣新文學》，1(10)。
- 楊遠（1928.12）〈水牛〉，《臺灣民報》，216。
- 楊華（1935.3.5）〈薄命〉，《臺灣文藝》，2(3)。
- 廖漢臣（1935.8.4）〈玉兒的悲哀〉，《臺灣文藝》，2(8)。
- 劍（1923.5.15）〈徹底的婦人解放運動〉，《臺灣民報》，1(3)。
- 劍如（1924.4.21）〈家族制度的將來〉，《臺灣民報》，2(7)。
- 賴和（1931.5.9、16、23、30、6.6）〈可憐她死了〉，《臺灣民報》，213。
- 繪聲（1935.2.1）〈秋兒〉，《臺灣文藝》，2(2)。
- 羅蕙錫（1914.12）〈理想的婦人〉，《學之光》。
- 羅蕙錫（1918.3）〈慶熙〉，《女子界》。

## 二、專書

- 宋明熙（1993）《韓國文學的現代性批判》。首爾：文藝出版社。
- 周憲文譯（1985）《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帕米爾。譯自失內原忠

雄（1928）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岩波書店。

許俊雅（1994）《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陳俐甫（1996）《日治時期台灣政治運動之研究》。台北：稻鄉。

喜安幸夫（1995）《日本統治台灣秘史》。台北：武陵出版社。

鄭英勳（2006）《近現代韓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首爾：韓國學中央研究院。

韓國女性研究會編（1992）《韓國女性史》。首爾：草葉。

權澤榮譯（1994）《拉康：慾望理論》。首爾：文藝出版社。譯自 Lacan, J. (1966)

*Écrit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三、期刊論文

宋仁和（1992）〈下層民女性的悲劇與自我認知過程〉，韓國女性研究會編《女性主義與小說批評》，251-283。首爾：大路社。

金福順（1992）〈支配和解放的文學〉，韓國女性研究會編《女性主義與小說批評》，27-64。首爾：大路社。

崔末順（2005）〈三〇年代台灣小說所反映的現代化真相與人的疏離〉，《韓中語言文化研究》，9: 381-400。首爾：韓國現代中國研究會。

## **The Conflict between Feudalism and Modernism: Position of Females in Taiwanese and Korean Novels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Mal-Soon Choi*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the 1920s wa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zation in Taiwan. Neo-intellectuals of the period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pan-culturalism was the global trend after World War I. They gave high importance to the trends of the time such as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 equal rights for men and women, and labor-management coope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ccepting the spirit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 values from the West to guide the general public towards a self-awakening. Modernism, however, with its core principles of human rationality and historical advancement, had developed a complex system of checks on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This occurr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lonial capitalism, and was compounded by ling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feudalism in Taiwanese society.

Female issues revealed in Korean novel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ere in large part also the result of female discrimination in traditional feudal society and were worsened by the exploitative nature of colonial capitalism. Women,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strata, were subject to ethnic, class, and gender oppression in a society composed of

colonialists, capitalists, and males. Educated *new women* would find it extremely difficult if they wished to pursue ideas and dreams, explore themselves, or master their own fate in a family system that was confined by feudalistic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a society that was neither mature nor open enough to accept their independence.

This Study has chosen Taiwanese and Korean novels publish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order to examine female issues in the two countries under the same situ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control. This study focuses its discussion on two groups, women of the underclass and *new women*, and explores the position and experiences of women at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perspectives of multiple relations,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feudalism and modernism and the values brought by colonial capitalism.

**Keywords:** Taiwanese and Korean literatures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female novels, new women, female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strata

◎作者簡介

崔末順，韓國人，政治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台灣和東亞國家的現代文學，撰有博士論文《現代性與台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及〈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文學運動的形成與發展〉、〈三〇年代台灣小說所反映的現代化真相與人的疏離〉等論文；另積極向學術界介紹韓國文學的工作，除了多次的學術演講之外，亦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光復後韓國文學的發展面貌〉、〈韓國的現代性經驗與全球化時代的課題〉等文，以及〈「四一九世代」的自信與力量——《創作與批評》及《文學和社會》〉、〈九〇年代後韓國文學的主流傾向——記憶的形式，慾望的語言〉等文章。

〈聯絡方式〉

E-mail: [tclmschoi@ccu.edu.tw](mailto:tclmschoi@ccu.edu.tw)

TEL：(05) 2720411 轉 31601